

Xiandaixing de Puxi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现代性的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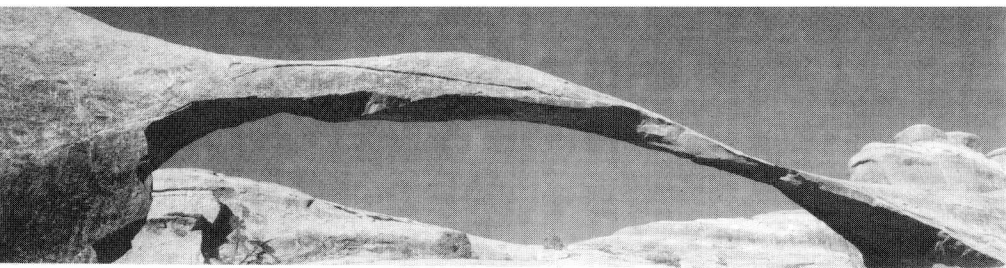
张凤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谱系/张凤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10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ISBN 978-7-214-07493-5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781 号

书 名 现代性的谱系

著 者	张凤阳
责 任 编 辑	戴亦梁
责 任 校 对	丁 萍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1304 mm 1/32
印 张	14.75 插页 4
字 数	38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493-5
定 价	41.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

泛泛说来,我对今天通常被称为“现代性”的问题发生兴趣,始于硕士研究生阶段。1983年,我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在李华钰教授指导下学习社会历史理论。那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改革才启动不久,大学校园的思想气氛异常活跃。南大学子,尤其是文科学子,喜欢背着绿色军用书包下图书馆,到学术报告场所占座位,还常常三五个人聚在一起,高谈中西之争、传统—现代之争一类的宏大议题。我是其中的一位。当然,思想的青涩和幼稚是免不了的。

1985年,我着手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十分宽宏,许我以很大的自由选题空间,但她的期望也给了我无形的压力。在整理和分析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的目光逐步聚焦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并且尝试着自我退出思想争鸣的场域,而作为中立的观察者对这一大讨论进行某种“局外”的理性审视。在当时的背景下,“左”和“右”、“保守派”和“改革派”之类的意识形态标签,还或隐或显地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取向,发生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中的观念纷

争尤其如此。只不过,随着思考的渐次深入,我的最大困惑却从这场大讨论内部移到了两场大讨论之间。另一场大讨论由经济学界发起,主题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据我当时的观察,哲学界持人道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可是,他们经常援引的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却逻辑地蕴含着对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实质性批判。这种落差该作何解释?表面看来,那些用异化理论表达人道主义关怀而又支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存在着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而那些为市场化改革作直接理论论证的经济学家,则更强地显现了思想与行动的前后连贯。但是,往深里想,也许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把认同改革的行动立场作为观察基点,那么,在理论上,哲学家人本诉求与经济学家市场化诉求的双峰对峙究竟有何意味?它们作为一体之两面,是不是反映了内在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矛盾紧张?

带着这样的疑惑,我转过头去,试图从西方近现代社会一思想变迁中寻求启示。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我当时的文献阅读还很不充分,但是,仅只看过收在中文资料汇编中的蒙田、帕斯卡等人的思想片断,先前在大学教育时期形成的若干印象就大大改变了。在相对系统地读完卢梭的作品之后,这种改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深化。原来,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有抗拒中世纪宗教禁欲伦理的世俗幸福主义呐喊,还有随物欲高涨而来的生存意义的迷惘;启蒙运动对个性解放的辩护,也不只是在世俗幸福主义的基础上再添加高傲的理性主义和通达的乐观主义,还有质疑文明进步,并表现出强烈反功利、反理性倾向的卢梭式的浪漫主义。我当时认定,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成长过程中,世俗幸福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是主流,而以反功利、反理性方式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则是支流。据此推断,中国学人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发起的那两场大讨论,是不是也折射了类似的逻辑呢?20世纪80年代初叶的情形是,市场经济大讨论不仅在理论界达成基

本共识,更在政策实践层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对比之下,在异化和人道主义大讨论中,观念分歧却难以弥合,而且,那种借异化理论表达出来的人本诉求,在政治合法性的获取上也显得命途多舛。个中意味,很值得咀嚼。

我的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位论文写作不好太过偏题。令我终生受益的是,在哲学系读书期间,我和学友从恩师孙伯鍈教授那里接受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训练。先生给硕士生开设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读”,内容涉及《马克思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在课堂上,先生从不拿讲稿,手里只捧着一部经典文本,读一段讲一段。他那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度的思辨式幽默,以及进入演讲状态后的陶醉神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以现今的标准,先生公开发表的论著不算太多,但在我们学生眼里,仅是他那五册油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讲义》,就堪当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座高峰。受先生启发,再结合自己研究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心得体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两种历史观之比较”。这篇论文写了十余万字,形式上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近代西方社会历史理论在“问题式”方面的结构性差异,深层的用意则是要思考,蕴含于近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两个彼此摩擦的取向——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总体理论框架中是否有所体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平抑或化解。对这篇论文,孙伯鍈教授和李华钰教授两位恩师都评价颇高,但我心里明白,他们的称赞是激励晚辈,只有在学问上不断进取,才不负他们的厚爱和期望。

二

1986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哲学系任教。按照起先拟定的计划,深

入发掘硕士论文中的隐含议题,是我彼时的研究重心。我曾跟几位师兄合作,写过几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文章,其中一篇的论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与‘多’”。依我个人的想法,这篇文章的主旨,借用拉卡托斯的概念,是要探讨实践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由一以贯之的“硬核”与多样化的“保护带”共同织造出来的张力结构。在我偏私的意识里,这篇文章,连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功能等等的其他一些文章,大略可以算作是自己硕士论文研究工作的某种延续。但是,为了在既有学科布局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后来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移——不是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而是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进展。因为这种转移,留校任教后暂定的研究计划不仅被修改,事实上还最终搁浅了。

在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的解读,有所谓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争,前者以阿尔都塞等人代表,后者以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等人代表。到了21世纪,尽管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重放异彩,但依据20世纪70—80年代的主流认识,其价值取向却有浓烈的“原教旨”保守意味。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我曾研读过阿尔都塞的几部代表作,并深受其“问题式”概念的启发。只是,出于一种不太好的研究习惯,在自以为弄清了一位思想人物的理论逻辑之后,我会把他放到一边。就这样,阿尔都塞在我的研究视野中暂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脉络,先是卢卡奇、葛兰西,接着就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

从80年代末开始,我一度将主要精力用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几份研究成果中,一篇讨论法兰克福学派价值预设的文章,自觉还算满意。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导取向号称社会批判,因而,其拒斥现实的否定性外观是可以直接把握的。但是,按照一种通顺的理论逻辑,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激愤指控,必以某种肯定性的价

值理想做参照。只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这种价值理想并不外显为明确的理论表达,而需“依据症候”——又用了阿尔都塞的概念——从字里行间去探寻。我的探寻结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预设整合了三种主要的思想资源,即,浪漫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人道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结论,以及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一些心得,对我在更为开阔的视域内思考现代性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慢慢认识到,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有一种激进的思想气质,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归入马克思主义阵营,是大有疑问的。反过来说,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激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认真省察的思想和行动事件,那么,仅仅用回到经典马克思的方式对这个事件进行分析与评估,就显得有些削足适履。于是,我就放弃硕士毕业后拟定的研究计划,而将自己的关切要点转向了另外三个问题。1. 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个浪漫主义的思想源头,又创新性地建构了一套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理论体系,因此,在研究中疏通一条贯穿现代文明成长全过程的自反性理路,便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不过,要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只抓住法兰克福学派还远远不够。2.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时候,常常使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概念。霍克海默、阿多诺将“知识即权力”的启蒙纲领从根子上挖出来,向世人抖露了它的浊气臭水;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反复提示说,科学技术在社会功能意义上已经意识形态化,实为极权操控的工具。但是,若逆向思维,那就得追问: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对象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究竟是什么?它以何种方式嵌入并支撑起了现代文明的框架结构?对这类问题的解答本质上是“描述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这是一项新的研究工作。3.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虽然犀利,其代表人物乐见并点拨过的青年造反也一度火爆,但退回来想一想,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是它

的特点也是它的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遭遇和生命经验,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应该在变革与稳健之间达成某种均衡。这样,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大约自90年代初起,我同时展开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三个不同的领域来回游走,颇有贪多嚼不烂之嫌,但我采取这样的研究方式,也有自己的特殊考虑。从攻读硕士学位到留校任教,我的专业训练、知识结构和研究取向都相对单一,长此以往,难免会固化自己的思维,而我认定,这即便不是死路,也是一条羊肠小道。所以,必须做出自我调整。可是,我又不愿使这三项研究工作彼此分立,而希望用一个中心议题来统领它们。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兴趣,这个中心议题当然就是现代性的成长。说到底,改单一观察维度为多元分析路径,无非是要在开放的比较视域中丰富自己对现代性的认识。因此,研究领域可以交错,却不好画地为牢。但令人痛苦的是,在尝试“三元归一”的整合性研究过程中,我深切体会了论域及问题的复杂。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位社会思想大家将自己的立场表述为三个“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进而分析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兴起之初曾有某种精微的一致性,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一致性却逐步蜕变成了三大领域的交错运转和摩擦冲撞:经济领域是所谓效益原则,政治领域是所谓平等观念,文化领域则是所谓自我表现。接触这些智慧的论点,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联系自己前已开展的研究,我醒悟到,现代性问题只有在一种复合性的理论框架中才能给出相对贴切的解释。在反复思考后,我也总结了四句话: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个性表现的放纵;大众文化的胜利。至此,我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总体思路就基本成形了。

总体思路的成形固然重要,但紧接着又来了新问题。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参考借鉴别人的相关成果,却不好模仿和照搬。现代性的多元取向和矛盾图景既有人指认,那就得进一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学术创新的可能空间究竟在哪里?当然可以对现代性的矛盾特征做出新概括,但掂量再三,我还是将研究重点确定为:以发生学的方法对现代性矛盾图景的历史建构进行深入考察,并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揭示其“所以然”的根由和机理。对我来说,之所以确定这样的研究重点,除了知识学意义的所谓求新,根本上还是源于自己挥之不去的本土情结。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先发国家为参照,对现代性的成长历程做描述性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些关节性问题。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的信念。只不过,基于学术研究的方法要求,要考察现代性多元取向的历史生成,仅仅诉诸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就不够了,此外还必须分析“主义”话语到底以什么方式被大众接受,并转换成了实际的社会行动。这样,我的学术兴趣就有了越来越浓的形而下意味。

三

1993年,我从哲学系调到了政治学系。就内心期待来说,自己很想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一类的课程,因为那样的话,关于“主义”的比较研究最方便开展。但当时这个教学岗位尚未空缺,所以,我服从组织安排,暂且继续自己的老本行,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任务,不过,课程的性质由“专业”变成了“公共”——那时候政治学系与马列教研室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由于公共课教学工作量过大,自己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学术爱好,只能在业余时间玩味,所以进展比较缓慢。但我生性有点懒惰,心里并不

怎么着急。我常常想,收敛匆匆的研究脚步,无论在文献研读方面还是在思路的精细化方面,都能多几分淡定和从容,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知识界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背景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经济领域的创造活力得到更充分的激发,但与此同时,市场化的触角也无遮拦地向公共领域延伸,“下海”成为席卷全社会的强劲风潮,人文意义的价值关怀被淡忘或遗忘了。对照自己前已展开的研究,我猛然觉得,这岂不就是西方现代化先发问题的中国式复现吗?以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契机,我开始重点推进现代性研究计划的第一部分。但研究工作一展开,我立即体验到了思路调整的痛苦——当直面“世俗趣味的高涨”这一现代性主流的时候,发生学方法的要点不在于指控它如何败坏了人文精神,导致了价值失落,而在于理性分析并解答以下问题:一种俗化的生活形态如何滋长并占了上风?市民德行与契约伦理有什么勾连?为个人追求感性幸福的权利做辩护是否必要及如何可能?逐利和竞争的市场博弈需要怎样的游戏规则?兼容并保障自由的政治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其应对社会衍生性问题的弹性空间有多大?如此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思路调整虽说难,可一旦转过弯来,眼前就现出了一片新天地。公共课教学多少掣肘了开垦这片天地的速率,不过,点滴收获带来的激动,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十分美好。

教学岗位调整以后,我的研究心得有机会在课堂上拿出来跟政治学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分享。我把这种机会当作激励,于是现代性研究计划的推进开始提速。考虑到政治学系的学生多属行政管理专业,他们的特殊求知期待必须在最低限度上照应,而量化分析又实在是自己的短板,所以,我的目光就投向韦伯,把解析官僚制的型构和运作逻辑当成了一个重要突破口。韦伯有“现代化”即“理性化”一说,对他而言,官僚制无疑是理性化进程在行政管理领域结出的一个坚硬果实。因此,借考察官僚制前世今生的机会,我将既定计划中的

“工具理性”问题拎了出来，集中精力实施攻关。待打通的关节有三个：1. “工具理性”的原型是什么；2. “自然”怎样被“数学化”；3. “工具理性”在何种作用机制下蔓延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以韦伯等人的论点为参照，自己再悉心揣摩，我对“工具理性”的品格特征作了16字概括，即，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有效控制。对我来讲，最艰苦的工作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描述从“自然的数学化”到“生活的合理化”的演进过程。《现代性的谱系》成书后，我对这部分内容特别偏爱——并非因为其学术质量真的高，而在于数理化一直是令自己苦恼的软肋。

在现代性研究计划实施过程中，我对那股绵延不断的反功利和反理性潮流关注得最早，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却结束得最晚。前面提及，我早年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即对浪漫主义有所涉猎，后来发表的几篇研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也可以归入这个论域。只不过，这些研究在风格上是哲学化的，并未考虑形而下的社会化维度。可是，在发生学意义上，这个维度又特别重要。90年代中期，借助贝尔的“自我表现”概念和贝拉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概念，我大致确定了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方位。由此继进，90年代后期，通过对尼采和福柯等人的研究，又领会到生命意义的形而上关怀可能在形而下层面发生变异。这个关节一旦打通，被冠名为“后现代”的各种论述，包括哲学的、文学的、语言学的、社会学的及伦理学的等等，就进入了我的观察和研究范围。再加上一些关于文化事件和社会行动的案例分折，到2001年，我总算按低度的精致化标准厘清了“审美现代性”一脉的演进或蜕变逻辑。在《现代性的谱系》一书中，这部分内容被表述为“性灵的漂泊和放纵的肉身”。

我的人生履历是从校门到校门，自以为，在大学教书是最理想的职业选择。略感遗憾的是，在硕士毕业后，我多次错失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校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明

显加快,一位大学教师如学历层次偏低,起码在形式上被认为有欠缺。在这种背景下,有朋友向我建议,赶紧把手头的研究计划完成,并将其用作申请博士学位论文。我接受了朋友的建议,而童星教授接受了我。那时候,童星教授是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导师。他在认真审阅我的写作提纲和部分文稿后,指点我按照社会学专业的规范要求,将论文题目定为“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文化社会学分析”。对童老师的独到眼光,我发自内心地叹服。有了名师的指导和督促,我的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经过补充、调整及反复修改,到2002年秋,全文的写作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四

2004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将我的这项研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编辑认为,“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文化社会学分析”适合作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但是,书名宜简洁明快,建议再推敲一下。思忖再三,我改成了《现代性的谱系》。姑且不说尼采的“谱系学”在后现代学术风潮中多么受宠,即以传统习俗论,我觉得,用“谱系”一词来描述现代性生成过程的多彩图景,大体上也是贴切的。现代性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大宗族”,要将其中的角色关系理清楚,必须寻查关键性的支脉。我辨析出三个,依次命名为“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这三个支脉都力争自己的合法身份,并出示了各自的辩护理由。从思想取向上判断,我以为分别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本书上、中、下三篇的总体框架,通俗地讲,就是对这三个支脉的查考取证。

我体会,在逻辑意义上,对现代性谱系的支脉做指认,尽管需要深度的思辨和准确的概括,其实并不怎么困难。比较起来,更困难的是历史考察。现代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望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固然是对立的“他者”,但颠覆这个“他者”的策略,现代性大宗族内部并无一致意见。如果再打另一个比方,我感觉,“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像是三个门派。这三个门派在实力上有强有弱,在关系上有亲有疏,在行为上有和有斗,可它们又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考察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时候,我还发现,每个门派尽管都以某种“主义”作为旗帜,但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旗帜的色调会有变化,而且,精英人物用旗帜发出的号令,在大众接受者那里往往被给出误差性的理解,于是就发生了社会化行动的变异甚至错乱。将诸如此类的情况综合在一起,我的看法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不是单向度的而是非线性的。

从动笔那一刻算起,我这本书大约写了十年。时间拖这么久,除了自己的懒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叙事风格的选择。现代性既是一幅多彩图景,其生成过程又具有非线性特征,那么,要将它相对贴切地描摹出来,就得采取一种复调式的叙事。但我同时认为,现代性已然是一个迷宫了,不好自己眩晕也让读者眩晕,而必须尽可能出具一幅清晰的线路图。按照我心目中的理想标准,这幅线路图应兼顾宏观和微观,远看敞亮近看精致。不消说,要画好它,得费很大功夫,更何况,由于工作上另有主业,我还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第二个原因是论题驾驭的艰难。现代性研究不仅要清理错综复杂的思想线索,还涉及哲学、文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因此,理解和驾驭这个复杂的论题,需要一点一滴地进行知识储备和学术积累,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研究计划的推进过程中,我常有力所不逮之感,也曾闪过放弃的念头。最终能坚持下来,过后回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个动力,也得益于一个窍门。

就现代性的国别呈现论,辩证法要求做两面思考。一面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另一面是,个别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本土流行的政治修辞是“中国特色”,但不要忘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再特殊,也总

不能完全脱离现代性的一般。因此,考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对理解当今中国发展已经遭遇和即将遭遇的诸多问题,至少在他山之石的意义上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这是我的研究动力。反过来说,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列车在快速飞奔,所以,立足本土的亲身观察和切肤体验,作为情境模拟,又可以帮助我们揣度和领会西方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某些重要关节与隐蔽机理。这是我的研究窍门。《现代性的谱系》初版时,师兄张一兵教授曾作过一个序。溢美之辞愧不敢当,但他从这部西学研究作品中看出了一个不在场的中国的影子并使之现身,我却特别喜欢。本书上中下三篇的标题分别是:“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自然的数学化和行动的合理化”、“漂泊的性灵和放纵的肉身”。师兄对这三篇理路的中国化解读,表达得比我本人还要到位,真不愧是名家。照录如下:

分开来看,本书所展布的现代性的多重面相,我们在国内外学者的描述中都曾见识过。事实上,对于身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们,这些面相应该说是具有可触摸的质感的。在幽闭的大门被打开之后,盈利欲喷涌而出的景象,仿佛是火山爆发,其强大的震撼力,已经使我们无法在生存处境中找到一所安宁的世外桃源。“世俗趣味的高涨和自由秩序的扩展”,将我们卷入了一个湍急的漩涡,在它的裹挟下,我们已不能悠闲地漫步,而只能拼命狂奔。我们的创造力被激活了,我们的选择越来越自主了,我们的私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了,但那个由货币符号抽象地编织出来的象征着“成功人士”的远景,却使任何雄心勃勃的个人发展规划暴露出本质性的欠缺;在用种种现代手法编码的无尽流动的景观世界面前,消费民主的诱惑也给我们带来了不断加大强度的眩晕。这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现代性。

记得在二十多年以前,高校大门的敞开曾给中国一代有为